

# 北海文史

## 第四辑

### 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忆旧

欧阳蓬口述 张九皋记录整理

我追随陈铭枢的十年(1929——1939)中，曾有过火烧不死、枪打不死、水浸不死、弹炸不死的奇异经历；上回已说到一九二九年我在香港“英皇酒家”火烧不死而脱险的经历。这回说说“一·二八”上海淞沪抗战枪打不死的经历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间，蒋介石在江西对苏区红军的第一次“围剿”失败，遂把善打硬仗的十九路军调来江西，接连发动第二、三次“围剿”。当时陈铭枢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，驻在兴国、吉安一带。第三次“围剿”开始时，蒋介石乘飞机亲临吉安督战。八月间的高兴圩一役，陈铭枢守在电话机旁亲自指挥作战，两天两夜没合眼。十九路军与红军交锋，战况激烈，双方伤亡惨重，谁也没占上风。对此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叙述的“对蒋光鼐、蔡廷锴两师，则打成对峙，让其逃去了。”

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军侵占沈阳北大营，并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。些时，蒋介石为确保京沪要地的安全，下令把十九路军调往京沪铁路沿线，元气大伤的十九路军遂于是年十月下旬调往上海休整补充。此前，十九路军在江西第三次“围剿”红军前便扩编了一个七十八师，师长区寿年，副师长谭启秀，参谋长李扩，辖 I55、156 两个旅，旅长分别为黄固、翁照垣。这样十九路军共三个师(另两个师番号为 60 师、61 师)约四万兵力。调防京沪后，陈铭枢任京沪卫戍司令官，驻南京，十九路军总指挥由蒋光鼐升任，军长为蔡廷锴。松沪警备司令为戴戟。

当时十九路军布防情况如下：

六十师(师长沈光汉、副师长李盛宗)驻苏州、常州，师部驻苏州；

六十一师(师长毛维寿、副师长张炎)驻南京、镇江，师部驻镇江；

七十八师驻淞沪、南翔，师部驻南翔。

在江西时期，我一直跟随陈铭枢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。目睹日本人的猖獗横行，我决心弃文从武，向陈铭枢请求到杀敌第一线去，后获准到七十八师一五六旅任旅部副官(中尉衔)随后任排长，几个月后升任连长。
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三十分，日军悍然偷袭我闸北驻军，忍无可忍的十九路军毅然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。

在日军进攻吴淞炮台时，原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闻风丧胆，畏罪潜逃，并把数十尊大炮的撞针带走，使要塞变成不设防的阵地，大炮也成了一堆废铁。我师接防后，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，即由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率张君嵩、钟经瑞团三个营进驻。十九路军基本上是广东籍军人；七十八师张君嵩团是一月二十八日在闸北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英雄。团内更多合浦籍的士兵。如钟经瑞一个外甥姓李的，才十九岁，即出任该团的连长，作战非常英勇。翁照垣接华振中出任156旅旅长，张君嵩恃闸北抗战有功，不怎么把翁放在眼里，认为他是一打就跑的衰仔，无法守住吴淞炮台。但战斗一开始，翁照垣旅长亲率我团击溃优势日军的多次进攻，翁那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和胆大灵活的指挥艺术令张非常佩服。

日军派出进攻吴淞炮台的是久经战阵的海军陆战队，骄横无比，气势汹汹，自恃武器装备好，天一亮就来进攻，泊于江面的悬挂太阳旗的敌舰以巨炮猛轰我炮台，然后从舰上吊下无数橡皮舟，舟上乘坐全副武装的陆战队，一批批的向我阵地开来，一时江面上布满了敌人的橡皮舟，我阵地上硝烟弥漫。我方的大炮由于缺少撞针无法对敌轰击，在敌炮火扫射时，我们一律躲在掩体内，待敌橡皮舟靠岸，陆战队员登陆并进入我步机枪射程我们才开火，猛烈的子弹射向敌人，敌人遭到猝然打击丢下许多尸体，龟缩在地上，稍停又调整阵容继续向我阵地扑过来，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也很艰苦，我方的伤亡也不少。我指挥的特务连编制上号称百多号人，但历经战火未得补充，仅剩下六十多人；装备更差，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，仅得两挺轻机，其余是步枪和菠萝弹(手榴弹)，我手持驳壳枪指挥战斗，子弹、弹片吱吱地从头顶、从身旁刷过，身边的弟兄也

一个个地倒下，伤亡了十多人，但却没有一颗子弹射中我，每天都和全体士兵及兄弟连队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，把阵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使敌人夺取炮台，进而对上海市区我军形成大包围圈的作战计划破产。

当时整个上海都动员起来支援我们抗击日军，商人捐赠各种生活用品和食品，学生、工人参加救护、运输弹药及支前慰问。经常有市民组成的慰劳队到炮台阵地上来慰问，携带大批市民捐赠的劳军物品，如香烟、罐头食品、食物等。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归国华侨慰问团，爱我们如爱自己的子弟。对抗日军人提出的要求只要能找到都拿出来。就在战火连天的阵地上，我们吃上了他们送来的美国产的金山橙。开军民联欢会时，我们团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即席演说，表示决不辜负广大市民，侨胞的关怀与支持，誓与阵地共存亡，抗击日寇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！为了表彰我们守卫吴淞炮台的辉煌战迹，师长区寿年特地在江西景德镇紧急定制了一批瓷碗，碗上书“每饭不忘国耻”几个大字，发给每人一只；军部并奖给每人一条毛巾。

十九路军保卫上海的英勇战斗，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，迫使日军四次增兵，从最初的不足万人续增至八万人；并四易其帅，先后撤换了盐泽幸一海军少将、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少将、植田谦吉陆军中将，最后由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领銜亲征。而十九路军以疲乏无援三万之师英勇抗击，伤亡逾万，幸得张治中军长亲率第五军助战使日军三面受敌，仓皇溃败；我156旅三千余人固守吴淞炮台月余，敌久攻不下，不得不改变主攻方向。

但我十九路军及友军英勇抗战的成果却让卖国媚敌的蒋介石葬送了，蒋为实施其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方针，企求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出面调停战事；而日军方面，遭到我军坚决抗击屡攻不下后，在国内及世界舆论面前丢尽了面子。不得不同意“国联”的调停，拾到一个可下的台阶。五月五日，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松沪停战协定》，十九路军被迫调离上海，暂驻苏州。我军撤离时，翁照垣旅长命我押运一批军用物资往苏州，我带了三名士兵乘船押送，完成任务后在苏州稍事休息即前往南京寻旧主陈铭枢长官，其时不幸染上

伤寒，陈送我入美国人办的鼓楼医院，半月后出院，就这样我离开了十九路军。

仅供阅读